

#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货币思想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视角

尹振涛

**〔摘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译介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基础上,将这一学说应用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形成了包括实行商品经济、利用货币关系摧毁旧货币机构和建立新货币机构、清查旧货币和通行新货币、独占货币发行和统一货币制度、控制纸币发行数量和保证纸币流通信用、坚持经济发行货币和积极组织回笼货币、努力吸收储蓄存款和贷款投放生产事业等一系列思想在内的红色货币思想。以红色货币思想为指导,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了第一次大规模建立货币体系的实践,全面推动了革命战争环境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为日后构建成熟的货币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土地革命战争 红色货币 革命根据地

**JEL 分类号:**B24 N25 P24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全面探索并取得丰硕创新成果的重要历史阶段。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从前一阶段简单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到开始自觉将这一科学理论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相结合,逐步开辟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这条革命道路的基本内容,就是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根据地为战略依托,进而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货币思想,就是在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货币学说而逐步形成的。

## 一、红色货币思想的依据与动因

红色货币思想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学说,这是从成立伊始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探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货币思想,自当以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为逻辑的起点与前提。

马克思关于货币学说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两部著作中。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这两部著作的内容也已开始在中国陆续得到译介。1919年6月至11月,北京《晨报》连载了陈溥贤(陈博生)以“渊泉”为笔名翻译的柯祖基(考茨基)著《马氏资本论释义》(1920年6月商务印书馆以《马克思经济学说》为书名出版),其第1编第2章即为“货币”,介绍了“价值尺度之货币”、“价格标准的货币”、“货币的流动”、

\* 尹振涛,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纸币的出现和职务”、“做贮蓄用的货币”、“做支付机关用的货币”、“做信用机关用的货币”、“世界货币”和“货币的资本化”等内容<sup>①</sup>。

然而,在从中国共产党酝酿成立到大革命时期这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尽管早期共产党人非常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但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译介方面,却是偏于剩余价值学说而略于货币学说。例如,李大钊在1919年10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在介绍马克思经济学说时就说:“马氏的‘经济论’有两要点:一‘余工余值说’,二‘资本集中说’”<sup>②</sup>。他这里说的“余工余值说”就是剩余价值理论。1920年9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汉俊翻译出版的马尔西著《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一书,通篇也都是围绕着剩余价值如何产生而展开论述,只是在讲到商品价格时才有一句提到货币说:“价格是怎样讲呢?就是拿来交换商品的那货币之称呼”<sup>③</sup>。至于马克思关于货币的起源、本质以及职能等问题的论述,则均未论及。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著有3种被译为中文,即1921年12月袁让译的《工钱劳动与资本》(《雇佣劳动与资本》),邝摩汉在1922年3至5月译的《绝对的剩余价值研究》、《相对的剩余价值研究》、《绝对的相对的剩余价值研究》(《资本论》第1卷第3、4、5篇)和李季在1922年10月译的《价值价格与利润》(《工资、价格和利润》)<sup>④</sup>。这些原著均未涉及到货币学说的内容。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自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著,也存在着这种选择性译介的情形。例如,李大钊在1922年2月所作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演讲,主要讲述的是剩余价值理论,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说,揭破了资本主义下之秘密”<sup>⑤</sup>。陈独秀在1922年4月的《马克思学说》演讲,在论述马克思经济学时,也同样介绍的是剩余价值理论,未提及货币理论,说:“二千几百页的《资本论》里面所反复说明的,可以说目的就是在说明剩余价值这件事”<sup>⑥</sup>。其他如施存统(施复亮)1922年翻译出版的日本高阜素之的《马克思学说概要》,杨匏安1922年3至4月连载于《青年周刊》上的《马克思主义浅说》和任弼时1925年5月发表在《中国青年》上的《马克思主义概略》等等,也大抵如此。直到1926年6月,由李季翻译出版了德国博洽德编著的《通俗资本论》一书,才终于出现了介绍马克思货币学说的文本,但是该书在第1章阐述商品问题时,没有像《资本论》原著那样接着阐述货币问题,而是直到讲完资本积累问题之后,才在第十六章讲解货币问题<sup>⑦</sup>。这种结构安排,在逻辑顺序上是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

总的来说,在土地革命战争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传播是非常欠缺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伊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当前行动的直接指南而接受和理解的。因此,在建党初期,当党把主要任务定位于工人运动时,就把揭露资本家剥削秘密和启发工人阶级觉悟的剩余价值理论首先提上传播的日程。继之,在实现国共合作之后,党的中心任务是开展国民革命,在理论上的注意力就集中在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对于尚未成为当前愿景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货币学说自然也就未能

① [德]柯祖基(Karl Kautsky)著、陈溥贤译:《马克思经济学说》,商务印书馆,1920年9月版,第53-84页。

②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③ [德]马尔西(Marry E. Marcy)著、李汉俊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新文化书社,1920年9月版,第16页。

④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0-371页。

⑤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⑥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89页。

⑦ [德]博洽德(J. Borschart)著、李季译:《通俗资本论》,社会科学社,1926年版,第225-246页。

顾及。

然而,在1927年8月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之后,党对于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学说有了比较迫切的诉求,其中的重要动因,就在于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认识到了红色政权的巩固离不开国民经济的发展,根据地的社会经济生活离不开货币,为此就须有科学的货币理论来指导经济工作。正是有了这种诉求的动因,党领导下的理论工作者经过辛勤耕耘,取得了全面译介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丰硕成果,具体表现在:

第一,完整翻译并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货币学说的两部原著。其中,刘曼在1930年3月翻译出版的《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1个中文全译本。同月,陈启修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是该书的第1个单行本,内容为《资本论》第1卷第1篇“商品和货币”,包含了马克思关于货币学说的主要论述。之后,这两部著作均有多种译本出版,其中《资本论》到1933年出齐了三卷的全译本。

第二,翻译并出版了一批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著作,其中1929年5月陈豹隐(陈启修)译的日本河上肇《经济学大纲》,1930年朱镜我译的苏联米哈列夫斯基《经济学入门》,1931年季陶达译的苏联拉比杜斯《政治经济学》等著作,都有详细阐述马克思货币学说的专门篇章,拉比杜斯的《政治经济学》中还有关于“苏联经济中的商品与货币”的论述。

第三,撰写并出版了一批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其中对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有所论述的著作有1930年出版的王学文著《近世欧洲经济思想史》,1931年出版的马哲民著《社会经济概论》,1933年和1934年相继出版的沈志远著《计划经济学大纲》和《新经济学大纲》,1935年出版的李达著《经济学大纲》以及狄超白著《通俗经济学讲话》等。

党的理论工作者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和中期所取得的这些成果,基本涵盖了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全部内容,并且具有系统性和通俗性,为中国共产党人完整地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提供了文本依据和学理基础。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货币思想,就是在运用这一学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起来的。

## 二、红色货币思想的内容和实践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八七会议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发动了100多次武装起义,并在这些起义的基础上陆续建立起了大小十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9年又和朱德率领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来发展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河南、四川、陕西、甘肃以及海南等10多个省份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这些根据地大都设立了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发行了红色政权的货币。红色货币思想,就是党在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为依据,并结合革命根据地的具体情况而形成的开展金融工作的指导思想。这些思想相对集中在当时党的领导人的一些报告和文章中,更多的则散见于党在这一时期的决议、法规、公告、布告、命令等文献中。

### (一) 实行商品经济和利用货币关系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就内部而言,还是处在以小农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状态,即毛泽东说的:“现在苏区国民经济的发展,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

事业与私人的事业,这三个方面同时进行的”<sup>①</sup>。这种不同利益主体互相之间的物品交换,必然要依靠商品交换的形式。就外部而言,是处在全国整体上的商品经济状态中,根据地为了打破白色政权的经济封锁,开展赤白两区之间的物品交流,也必须采取商业贸易的形式。因此,党在根据地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即发展商品经济,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如张闻天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中说的:“苏维埃政府,不但不禁止贸易的自由,而且鼓励商品的流通”,并且“苏维埃政府特别鼓励对外贸易的发展……使赤白的贸易,更能流通起来,使白区的商品大批的廉价的运入,赤区的商品则大批的高价的卖出”<sup>②</sup>。

实行和发展商品经济,必然离不开以货币为媒介形式。因此,各个根据地几乎都是从一开始无一例外地沿用了货币制度。例如,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1928-1930年,革命根据地的红色货币就有1928年2月朱德、陈毅领导湘南起义后发行的耒阳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劳动券,同月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加盖印章的银票,1928年5月开始使用的井冈山根据地“工”字银元,1929年8月开始流通于东固根据地的平民银行铜元票,1930年开始流通于赣西南根据地的东古银行铜元票、闽西根据地的工农银行银元票、赣南地区的江西工农银行铜币券,以及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银元票、监利县苏维埃信用券、沔阳县苏维埃信用券、石首农业银行信用券、鄂西农民银行信用券、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银元券等等<sup>③</sup>。说明各根据地对利用货币关系的必要性是有共同认识的。

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货币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因为“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是“商品流通的中介”,“在商品世界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sup>④</sup>。列宁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也恢复了货币金融关系,指出:“我们没有做到一下子废除货币。我们说,目前货币还保留着,而且在从资本主义旧社会向社会主义新社会过渡的时期,还要保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sup>⑤</sup>。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在夺取政权之后在根据地发展商品经济和利用货币关系的思想,不但符合根据地的实际情况,而且也符合马克思关于货币是商品交换媒介的观点和列宁关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制度下仍应保留货币的思想。

## (二) 摧毁旧货币机构和建立新货币机构的思想

利用货币关系来发展根据地的商品经济,必然要有相应的经营和管理机构作为依托。在资本主义社会,“银行家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sup>⑥</sup>。而在工农掌权的革命根据地内,这种具有货币资金“总管理人”职能的银行仍然是必要的,不过前提是要改变其阶级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建立政治统治之后,必须“取消一切私人银行和银行家”<sup>⑦</sup>。他们还认为,巴黎公社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没有把“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sup>⑧</sup>。正是根据这种理论,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工作中,确立起了摧毁旧银行和建立工农银行的指导思想。

不过,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毕竟在性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其斗争对象是反帝反封建而不是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因此,在对待旧的货币机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页。

③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上册,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5-5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136页、86页。

⑤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3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的政策上,也是有所区别的。其中,对于外国在中国开办的银行,党实行的是没收政策。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十大政纲”明确宣布:“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sup>①</sup>。对于封建性质的金融机构,如高利贷的典当行铺,党采取的是严格取缔政策。而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银行,则允许其继续存在,但要进行限制和监督。1931年11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规定:“城市与乡村贫民被典当的一切物品,完全无代价的归还原主,当铺应交给苏维埃”;“对各土著及大私人银行与钱庄,苏维埃机关应派代表监督其行动”<sup>②</sup>。

在摧毁和限制旧银行的同时,各根据地都把建立新银行作为经济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例如1929年9月闽西根据地在取缔高利贷之后,马上决定“由县政府设法开办农民银行,区政府设立借贷所,办理低利借与农民”<sup>③</sup>。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通过的十大政纲,其中之一就是:“由政府设立农民银行,借给农民资本以消灭高利贷资本的剥削”<sup>④</sup>。由于各根据地的创建时间有先有后,且都处于被分割包围、各自为政的状态,因此所建立的银行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名称上,都不够划一。尽管如此,新银行在性质上则是基本相同的,即都是为工农群众服务的银行。例如,1927年10月广东海陆丰根据地建立之后,在1928年2月即成立了“海陆丰劳动银行”,并发布通令宣布,此银行是为了“使工农贫民在推翻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有此借贷机关,得以从事生产,发展社会经济”<sup>⑤</sup>。此后,各根据地的银行相继建立,并随着根据地的扩大而扩大。例如,在湘鄂赣地区,相继建立了东固平民银行、江西工农银行、平江工农银行、万载工农兵银行、宜春工农兵银行、浏阳工农兵银行等。其他如湘鄂西根据地、闽赣根据地和陕甘宁根据地等,也都先后建立了工农银行或苏维埃银行。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同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指出:“为着实行统一货币制度并帮助全体劳苦群众,苏维埃应开办工农银行,并在各苏维埃区域内设立分行”<sup>⑥</sup>。根据这一精神,1932年2月在中央根据地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这种统一性的货币机构为推动各革命根据地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奠定了组织上的保证。

### (三)清查旧货币和通行新货币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革命人民在推翻旧政权和建立新政权之后,必须“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sup>⑦</sup>。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同时也根据中国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提出了清查旧货币、通行新货币的思想。

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前的旧币有硬币和纸币两种形式,苏维埃政权对这两种货币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对于旧币中的硬币即银币和铜币,由于它们是用一定重量和面额价值的贵金属铸成的通货,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18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

④ 《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6),江西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3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18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所以仍然允许其在根据地内继续使用,如闽西苏维埃政府在1930年6月的布告规定:“金融为市面流通之物,无论时洋杂洋自应一体流通”,以便把“银色好的杂洋集中至赤色区域的市面来”<sup>①</sup>。这样,苏维埃政府就可以通过回笼这些货币,筹措到更多到白区去贸易的资金。

但是,对于旧货币中的纸币,则采取通过清查加以区别对待的措施。闽西根据地最初的规定是清除旧货币,“禁止劣币及白区纸币的使用”<sup>②</sup>;“国民党军阀、资本家的纸币应排除出苏区去”<sup>③</sup>。但很快认识到,这些纸币可以用来到白区去购买货物,于是不再禁止旧币的使用,而是用折价的方式,既允许旧纸币在根据地流通,“但它的价一定要照大洋价减低四分”<sup>④</sup>。鄂豫皖根据地则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允许流通折价使用的政策,如该根据地的皖西北地区最初规定:“对于反动的国民党政府中央票不用,但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的票子可以通用”,但是要“打八折”<sup>⑤</sup>。后来,则把中央银行的纸币也包括在可以流通的范围之内,提出“国民党‘交通’、‘中央’等纸钞在苏区一概九六折扣”<sup>⑥</sup>。对于鄂豫皖根据地的这种做法,中共中央在关于鄂豫皖根据地的决议中予以了肯定,说:“暂时可不必废除旧的货币,它与苏维埃银行或工农银行所发行的货币可有同样的价值”<sup>⑦</sup>。也有的根据地采取的是对旧纸币加盖红色印章后允许流通的办法,如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暂借南丰织造厂附设劳动银行,并将该厂定制银票贰万元,加盖该行印章发出行使”<sup>⑧</sup>。江西根据地是“将吉安临时辅助货币一角价值的加盖我‘江西工农银行暂借发行券’与盖五角形赤区通用的图印,后面并加盖‘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方印以昭信用”<sup>⑨</sup>。

上述这些措施和方法,都体现了清查旧货币和通行新货币思想的具体运用。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成立时,这一思想作为原则正式确定下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明确规定:“苏维埃区域内旧的货币在目前得在苏维埃区域通行”,但“苏维埃须对于这些货币加以清查以资监督”,同时规定“苏维埃应发行苏维埃货币,并兑换旧的货币”<sup>⑩</sup>。不过,对于在旧货币上加盖苏维埃印记的做法,则由于考虑到加盖之后再也无法拿到白区去购买根据地所需要的物品,而将其修改为“对于旧的货币开始亦可采用,加盖图记通用。外来之货币须一律兑换已盖苏维埃图记之货币,或苏维埃自己发行之货币”<sup>⑪</sup>。这就既可以使加盖图记的旧纸币在根据地内流通,又回笼了新流入根据地的外来货币,使白区货币不致浪费而为红色政权所利用。

#### (四) 独占货币发行和统一货币制度的思想

实行货币的独占发行,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后要对银行和货币“独享垄断

①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下册,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② 邓子恢:《龙岩人民革命斗争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4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9页。

④ 蒋九如:《福建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⑤ 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一),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68页。

⑥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下册,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8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00页。

⑧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下册,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⑨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下册,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18页。

⑪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0页。

权”<sup>①</sup>的应有之义,也是革命根据地通行新货币思想的逻辑延伸。因为,如果新货币与其他货币同时并行而不是独占发行,那么必然的后果就是货币市场的严重失序及其新生政权经济基础的动摇。因此,中共中央要求各个根据地,必须“把发行纸币的权统一在苏维埃政府银行手里”<sup>②</sup>。据此,各个革命根据地在发行新货币的同时,都把拥有独占发行货币的特权作为一项原则规定下来。例如闽浙赣根据地规定:“严禁私人银行发行纸币,只有苏维埃银行才能发行纸币”<sup>③</sup>。鄂豫皖根据地也是“发行根据地货币,确立根据地货币为法定货币地位”,“以根据地货币为各项税收、结算、交换流通的唯一法定货币”<sup>④</sup>。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明确指出:苏维埃国家银行“有发行货币之特权”<sup>⑤</sup>。根据这一精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于1932年2月1日正式开业,在同时颁布的国家银行暂行章程第二章第八条中规定:“本行由中央政府授予发行钞票之特权,得发行各种之纸币”<sup>⑥</sup>。这个货币独占发行的思想后来成为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

为了使货币独占发行的原则在操作层面上有所依托,实行统一的货币制度是必然的要求。然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都是通过“工农武装割据”,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和从少到多而逐渐建立起来的,不但时间不一,地域分散,而且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包围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各根据地在初期往往由各县或区苏维埃政府自办银行和自发货币。然而,随着根据地逐渐扩大到多个县区的境域之后,这种各自为政的办法显然是需要改变的。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适时地提出了“实行统一货币制度”<sup>⑦</sup>的思想。为此,根据地的党和政府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是建立相对统一的货币体系。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武装起义和武装割据,建立起了“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sup>⑧</sup>。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原来一小块一小块的红色区域已经相对集中地连接成为了若干大块的根据地。在这种形势下,各大根据地在各自的区域内实行了相对统一的货币制度。在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成立后,统一了已经连成一片的赣南和闽西两个地区的货币制度。在鄂豫皖根据地,于1932年1月成立了鄂豫皖苏维埃银行,将原来分属于皖西北、豫东南和鄂豫边的银行统一为一体,建立起了在整个区域内相对统一的货币体系。在湘鄂西根据地,于1932年成立了苏维埃国家银行湘鄂西分行,统一了原来分属于鄂西、鄂北和湘鄂边三个地区的货币制度。在闽浙赣根据地,1932年12月成立了苏维埃国家银行闽浙赣省分行,将原来赣东北和闽北两地的货币统一到一个体系中来。在湘赣根据地,于1932年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工农银行,1933年1月改名为苏维埃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在该地区实行统一的货币制度。在湘鄂赣根据地,1931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7册,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97页。

③ 张书成和许炳南:《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

④ 胡菊莲主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18页。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0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18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

10月成立了鄂东南工农银行,将原来分属于平江、修水、大冶、铜鼓、万载、宜春、阳新等县的货币制度纳入到一个相对统一的体系之中。这种分区域相对统一的货币制度,起到了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的重要作用。

二是实施完全统一的货币政策,即各大根据地可以建立相对独立的货币体系,可以独立发行各自的货币种类,但是在货币政策上则必须是一致的。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之后,虽然在货币体系的范围上还只能限于中央根据地,但是它所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却是具有货币立法性质的文件,其中所规定的各项条例,在各个根据地都是必须要遵行的。

#### (五)控制纸币发行数量和保证纸币流通信用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论述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五大职能,其中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又是货币的基本职能。对于根据地建设的实践来说,最具有理论和现实双重指导意义的是货币职能理论中的货币流通规律,即:“就一定时间的流通过程来说是: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这个规律是普遍适用的”<sup>①</sup>。而在纸币流通的条件下,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又是纸币流通规律,即:“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这一规律简单说来就是:纸币的发行只限于它所象征地代表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sup>②</sup>。根据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同时考虑到农村根据地的现实条件和革命战争的实际需要,党在领导开展根据地金融工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控制纸币发行数量和保证纸币流通信用的思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所发行的货币既有金属货币,也有纸币和布币,其中纸币是主要的流通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各根据地大都是以一定数量的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及铸币作为纸币发行的保证基金。例如,闽西第一次工农兵大会通过的决议规定以现金即银元作为基金,说:“信用合作社要有五千元以上的现金,请求闽西政府批准者,才准发行纸币,但不得超过现金之半数”<sup>③</sup>。湘赣根据地以“群众集股二万元”银元并“收了三万多两银器”为基金,“发行一万至二万纸币”<sup>④</sup>。湘鄂西根据地作出决议案,要求必须“在有充分基金准备才发行纸币”<sup>⑤</sup>。中央苏区国家银行成立后,在章程的第三章第十条中明确规定说:“发行纸币,至少须有十分之三之现金,或贵金属,或外国货币为现金准备,其余应以易于变售之货物或短期汇票,或他种证券为保证准备。”<sup>⑥</sup>后来,大多数根据地基本都是按照国家银行的这种30%的比例来控制纸币的发行数量,并且在发现纸币发行量超过这一比例后,都相应地采取减少纸币发行、增加准备基金及回收纸币等措施,来确保把纸币的发行数量控制在适当的限度之内。

控制纸币的发行数量,目的在于稳定纸币的币值和保证纸币的流通信用。而这一目的能否实现,则取决于纸币能否与金属货币的充分兑换。为此,各根据地都作出了纸币与金属货币自由兑换的规定。在各个根据地发行的纸币票面上,均印有“驳兑现洋”、“凭票即付银元”、“一律通用随时兑现”等字样,例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一元券就印有“凭票即付银元一元”。1930年9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在建立工农银行时即规定:“在目前为提高信用起见,凡各级政府以及合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5页。

④ 《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39页。

⑤ 刘崇明、祝迪润主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页。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0页。

社一律负责兑现这种纸币”<sup>①</sup>。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布的命令要求,在各地设立“国家银行钞票兑换处”,“对持钞票要求兑换者,须尽量兑付现洋,不得拒绝”<sup>②</sup>。由于苏维埃的纸币可以随时兑换银元,在人民群众中很快赢得了较高的信用。在鄂豫皖根据地,“银行当时能兑银元,群众拿苏维埃票子,随时可以到新集银行兑换成银元”,群众甚为方便,因此“都愿意要苏维埃的票子”<sup>③</sup>。苏区刊物《斗争报》报道川陕根据地纸币流通的情况说:“苏维埃钞票,境内畅行无阻,且信用极高,群众多自愿以银元存入银行,以其兑现充足故也”<sup>④</sup>。

#### (六)坚持经济发行货币和积极组织回笼货币的思想

货币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货币的流通必须与商品的流通相适应,币值才能稳定,这是货币流通规律的客观要求。因此,货币的发行必须要坚持经济发行的原则。但是,革命根据地毕竟是在战争环境中建立起来的,并且在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过程中始终与战争相伴随,“在长期国内战争的条件之下,增发纸币常常是弥补财政收支不敷的一个办法”<sup>⑤</sup>。财政性支出除了军费之外,还包括各级政府的行政经费。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需要和财政性支出这两个方面的货币投向,成为摆在苏维埃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各根据地初创的时期,各地苏维埃政府还都能够按照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来组织货币的发行,而把单纯的财政支出放在次要的地位。例如闽西苏维埃政府规定工农银行资金投向的比例是:“库存不动的现金 30%;投入闽西政府及各级政府 10%,投入各种合作社 25%;社会市面流通 13%;投入苏维埃商店和土地生产 15%”<sup>⑥</sup>。除了作为准备金的 30% 之外,一半以上的资金都投向了商品流通和生产领域,而财政性用款只占到 10%。按照这种比例,基本能够保持红色货币的币值,是比较审慎和合理的。

然而,以比较低的货币投入来支持比较大的政府和军需供给,显然是不能满足的。在这种情况下,红军的军事经费从何而来呢?早在毛泽东领导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就确定把“打土豪筹款子”<sup>⑦</sup>作为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不但红军的军费主要靠自身筹款来解决,即便是苏维埃政府拨付给军队的钱物,也主要靠打土豪所得。1930 年 10 月至 1931 年 9 月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其中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战争给养“完全靠红军自己来筹”<sup>⑧</sup>。

然而,到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期,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提出了实行财政统一,以逐渐解除正式红军的筹款任务而专一进行革命战争的思想。1932 年 9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部发出训令,要“转变过去依靠红军筹款的路线,做到政府供给红军战费,使前方部队解除筹款任务,迅速进攻敌人”<sup>⑨</sup>。从这时起,“前后方红军给养已经是中央财政负责支付了”<sup>⑩</sup>。据

①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下册,文物出版社,1982 年版,第 3 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 368 页。

③ 谭克绳等:《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216 页。

④ 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 336 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72 页。

⑥ 蒋九如:《福建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 年版,第 58 页。

⑦ 罗荣桓、谭震林等著:《亲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6 页。

⑧ 《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土地革命时期》(内部送审稿)下册,第 1328 页。

⑨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05 页。

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12 页。

时任国家银行副行长曹菊如的回忆,由于军政费用开支浩大,“日渐增多地依靠发行纸币”,到了1933年“纸币发行达到约二百万元”<sup>①</sup>。超量增发纸币必然引起纸币贬值,导致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为了扭转这种局面,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指出:“苏维埃政府对于纸币的发行应该极端的审慎。纸币的发行如超过市场所需要的定额之外,必然会使纸币跌价,会使物价腾贵,使工农生活恶化起来,以致影响到工农的联合”<sup>②</sup>。毛泽东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了发行纸币首先要按照经济发展需要、其次再考虑财政性支出的思想,说:“国家银行发行纸票的原则,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方,这一方面的充分注意是绝对必需的”<sup>③</sup>。

为了稳定币值,中国共产党人还提出了积极组织纸币回笼的思想。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要求超量发行纸币的苏维埃地方政府,要“采取一切方法收回他们过去滥发的纸币”,并具体指出纸币回笼的渠道,一是“尽量在苏维埃经济的发展中增加各种税收的收入”;二是“必须更注意于对外对内贸易的发展”;三是“尽量输入现金与限制现金的输出”;四是“使苏维埃金融在经济建设的发展中极大的活泼起来”。通过这些措施,来“增加市场吸收纸币的容纳量”,“免去苏维埃纸币跌价的危险”,“维持苏维埃纸币的信用”<sup>④</sup>。这一积极组织货币回笼的思想,后来成为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一个长期指导思想。

#### (七)努力吸收储蓄存款和贷款投放生产事业的思想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论述货币具有“贮藏职能”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论述了银行通过吸纳处于贮藏阶段的货币,而形成货币借贷资本的过程。他指出:“自从银行对存款支付利息以来,一切阶级的货币积蓄和暂时不用的货币,都会存入银行”<sup>⑤</sup>。而银行把这些闲散货币集中起来的目的,则在于生成借贷货币,即“当这一货币在一个地方作为存款沉淀下来时,它在另一个地方就会立即再作为贷款发放出去”<sup>⑥</sup>。正是基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概括出了“吸收群众的存款,贷款给有利的生产事业”<sup>⑦</sup>的思想。

在土地革命时期,各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在建立银行之后,都很快确立起了要努力吸收存款的思想。湘赣根据地在1931年12月的工农银行简章中规定:“凡属各级政府及各革命团体与革命群众,如有余裕金钱愿储蓄在本行者,均一律收储”<sup>⑧</sup>。闽浙赣根据地在1933年3月的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提出:“应该鼓励群众向银行入股与储蓄”<sup>⑨</sup>。在中央苏区,不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暂行章程》中列有“收受各种存款”<sup>⑩</sup>的业务条款,而且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还专门发表《发展与

① 曹菊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工作的部分情况》,载《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3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75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页。

⑧ 《湘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编:《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52页。

⑨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下册,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

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9页。

参加储蓄运动》的文章,指出储蓄的意义在于:“可以鼓励广大工农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从事节省,将所节省的零钱存入银行,使得聚少成多,化零为整。而银行普遍地集中与灵活地运用这些社会余资,投放到各种合作社,尤其是信用合作社,以及工农群众中各个人所经营的生产事业上,大大发展苏区生产,扩大对外贸易”<sup>①</sup>。

在贷款投放方面,苏维埃政府确立了重点扶植农业生产、兼顾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思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定期信用放款暂行规则》第一条即明确规定:“本规则专为各种合作社和贫苦工农群众,用途确系有利于发展社会经济之放款而定。”并列出具体的借款项目为:“凡工农群众借款用途为下列之一者,均得向本行要求借款。(1)购置农具或肥料;(2)耕种用费;(3)开辟荒田和整顿水利;(4)其他有关于发展社会经济之用途”<sup>②</sup>。湘赣根据地工农银行简章中规定:“凡革命的工人农民兵士小商人劳动贫民,如遇在发展各种生产事业的必要上得到当地苏维埃政府的保证,而在本银行财力可能时,亦得借贷应用”<sup>③</sup>。闽浙赣根据地《财政与经济问题的决议案》规定:“银行的资本,最大部分是要用于帮助各种合作事业的建立发展;并贷款于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帮助他们制办工具、购买耕牛、耕具和肥料”<sup>④</sup>。为了扶持农业生产,各根据地都实行了低利借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借贷暂行条例的决议》规定:“苏区中借贷利率,高者短期每月不得超过一分二厘,长期周年不得超过一分”<sup>⑤</sup>。湘鄂西根据地农民银行也明确规定自己的任务是:“本行办理低利借贷”<sup>⑥</sup>。这种低利贷款不但能够解决农民的暂时困难,有的根据地还以此组织了生产竞赛运动,推动了经济生活的恢复和发展。

### 三、红色货币思想的作用和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战火硝烟中诞生的红色货币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并结合根据地建设实际而形成的认识成果,不仅对当时的根据地货币实践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为红色政权的巩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而且为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学说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增添了宝贵的财富。

#### (一)红色货币思想的历史作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最为艰难困苦的年代,在这样一个时期所形成的红色货币思想,对于指导和推进这一时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使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红色货币思想直接指导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建立货币体系的实践。由于有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为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人在建立起政权之后,哪怕只是在一小块一小块的割据区域内,而且是在自然经济成分浓厚的农村地区,也能够快捷地树立起一系列以货币为杠杆来开展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新疆金融研究所编:《革命理家毛泽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页。

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新疆金融研究所编:《革命理家毛泽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111页。

③ 《湘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编:《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52页。

④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下册,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7页。

⑥ 湖南省财政厅编:《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摘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91、504页。

金融工作的思想。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各个根据地都能够卓有成效地建立货币机构和实施货币政策,快速地占领和统一割据区域内的金融市场,全面地推动根据地金融工作的开展。期间,尽管也有“左”倾错误的干扰,但总的来说,根据地的金融秩序相对稳定,金融市场基本处于一种活跃和健康运行的状态,实现了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有计划地调剂整个苏区金融”<sup>①</sup>的任务。

与此同时,红色货币思想全面推动了革命战争环境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开辟的各个革命根据地,从一开始就都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产物,并且自始至终都伴随着革命战争的炮火硝烟。在这种环境下所形成的红色货币思想,必然一方面要努力遵循货币流通的一般规律,“按照市场需要的原则”<sup>②</sup>开展金融工作,努力稳定币值,大力给农业和工商业提供支持资金,为繁荣苏区经济、保障群众生活和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要遵循战时货币的特殊规律,按照苏维埃政府“用一切办法去保障红军的给养、供给与运输”<sup>③</sup>的要求,努力筹集和提供军费开支,为保证军需、支援革命战争和战胜敌人的军事“围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职能作用。

## (二)红色货币思想的理论意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探索中国革命理论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所形成的红色货币思想,尽管还没有系统理论形态的阐述,但是理论体系的总体框架和主干内容却都已构建出来,这为日后党在理论上逐渐走向成熟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首先,红色货币思想为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马克思的货币学说是基于欧洲国家以商品经济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展开论述的,而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货币思想,则是基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在以自然经济即“地方的农业经济”<sup>④</sup>为主体的农村地区进行武装割据的背景下形成的。因此,这一思想是以马克思货币学说为指导,结合具体应用的实践而形成的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和社会实际相结合的货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学说。

其次,红色货币思想为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增添了具有重要价值的内容。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所取得的最大理论成果,就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而创立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涵,是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这三者之间的密切结合,其中根据地建设的任务,则是要通过开展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sup>⑤</sup>。而红色货币思想,就是根据地经济建设中的核心内容,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具有重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一理论体系占有重要的地位。

最后,红色货币思想为党在日后构建货币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红色货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货币问题认识历程的逻辑起点,它为日后中国共产党货币思想的不断发展和走向成熟奠定了前期的基础。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乃至到中华人民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5页。

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红色货币发行数量和流通范围的日益广大,红色货币思想逐渐丰富和发展为完整的货币理论体系,但是就主要精神和核心原则而言,则始终体现了对土地革命时期红色货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这一思想深刻而又长远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 《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土地革命时期》(内部送审稿)下册,1978年版。
-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
- 《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6),江西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 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1983):《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一)》,安徽人民出版社。
- 博洽德(1926):《通俗资本论》,社会科学社。
- 曹菊如(198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工作的部分情况》,载《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
- 邓子恢(1961):《龙岩人民革命斗争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
- 胡菊莲(1998):《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
- 湖南省财政厅(1998):《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摘编》,湖南人民出版社。
- 姜宏业(2008):《中国金融通史》第5卷,中国金融出版社。
- 蒋九如(1994):《福建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
- 柯祖基(1920):《马克思经济学说》,商务印书馆。
- 刘崇明、祝迪润(1996):《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
- 罗华素、廖平之(1998):《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
- 罗荣桓、谭震林等(2007):《亲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江西人民出版社。
- 马尔西(1920):《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新文化书社。
- 石毓符(1984):《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
- 谭克绳、马建离、周学濂(1989):《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新疆金融研究所(1994):《革命理财家毛泽民》,新疆人民出版社。
- 许树信(2008):《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中国金融出版社。
- 袁远福、巴家云(2003):《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
- 张家骧(2001):《中国货币思想史(近现代卷)》,湖北人民出版社。
- 张书成、许炳南(1996):《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83):《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201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第7册、第8册、第10册、第11册,中国文献出版社。
-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2013):《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4卷,人民出版社。
- 中国人民银行(2012):《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简史》,中国金融出版社。
-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1982):《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上册、下册,文物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1986):《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 周骏(2001):《马克思的货币金融理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辰)